

赤练蛇文丛
Chilianshe Wencong

当代
文坛
酷评
四家

衡量一个批评家，可以从他的批评中看看他对批评对象里所体现出来的生活质感，有没有、有多少敏感和悟性。

陈
冲·著

把猫头鹰
和夜莺分开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赤练蛇文丛
Chilianshe Wencong

当代
文坛
酷评
四家

把猫头鹰 和夜莺分开

陈冲·著

需要一个好的评家，可以从他的批评中看
看他对批评对象所体现出来的生活质
感，有没有，有多少敏感和悟性。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猫头鹰和夜莺分开 / 陈冲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 4

(赤练蛇文丛 / 韩石山主编)

ISBN 978 - 7 - 5378 - 3874 - 0

I. ①把… II. ①陈… III. ①世界文学 - 文学评论 - 文集
②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106 - 53 ② I 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9988 号

书 名: 把猫头鹰和夜莺分开

著 者: 陈 冲

责任编辑: 赵 婷

封面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营销部)

010 - 84450697 转 602 (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 - 5628680 010 - 84929417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182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13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3874 - 0

定 价: 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前度刘郎今又来

(代自序)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两句流传颇广的唐诗，原诗题为《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公元772年至842年，字梦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题中“乐天”是白居易的字，此诗为二人席间唱和之作。就诗论诗，不算顶尖好诗，在刘禹锡自己的诗作中亦如此。各种流行的普及型唐诗选本，一般都选有刘禹锡的诗，但本诗多不入选，故开头所引两句，亦少为人知。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突然之间被频繁引用，遂成家喻户晓的名句。始作俑的专利应归属何方贵人哪名笔杆子，一时无从考证，大略是夺了权的造反派，将自己比喻为争春的“万木”，竞过的“千帆”，那种平步青云春风得意扶摇直上的感觉，倒是与诗句所造的意境，相当地吻合，相当地贴切。这也使人觉得，原诗虽非顶尖好诗，这两句倒不失为佳句。然则在引用者，是“反其意而用之”吗？不是，起码不像。况且那“意”最终也没反过来，仍如原诗所暗示，

争春的“万木”转眼便成了枯枝败叶，竞过的“千帆”一晃而过便不知所往。看来引用者既不知原诗的全貌，亦不知写作的背景，又彻底误读了所引的两句。由于全诗并非顶尖好诗，以至其中的佳句被埋没了千余年少为人知，只因这彻底的误读，竟得以突然成为传诵一时的名句，真不知该视为奇谈，还是应传为佳话。以“沉舟”“病树”自况的刘郎泉下有知，又不知当作何感想了。

刘禹锡的自称刘郎，是在两首更好也更有名的诗中：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所写的《游玄都观》，大和二年（公元828年）所写的《再游玄都观》。刘禹锡有过一段短暂的“少年得意”的经历，21岁即中进士，很快官至监察御史。政治上是个革新派，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正月，参加“二王（王湊、王叔文为首）变法”，八月，变法失败，刘禹锡被贬出京，时年33岁。一去十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召还长安，执政者原有重用之意，不料他却写下了《游玄都观》。全诗共四句：“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矛头直指靠迫害革新派爬上去的新贵，和任用新贵们的当政者。诗中，那使大道变“紫”、使尘土变“红”的“桃千树”，正是后来“万木春”的意象的渊源。刘禹锡为这首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再次被贬出京都，这一去又是十三年。公元826年北归洛阳途中，在扬州遇白居易，酒宴上，白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内有“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之语，对刘表示了同情和称赞，刘亦吟诗作答，遂有“沉舟”之句，一如既往地“万木”“千帆”给予尖刻的嘲讽与鄙夷。次年（公元827年）至洛阳为主客郎中，一年后回到长安，似乎又有了被重用的机会。但他毫不“接受教训”，又写了《再游玄都观》。仍是四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尽管当时

的政治现实谈不上革新派的胜利，但生活现实中玄都观的“荡然无复一树”给了诗人一个契机，一句“桃花净尽菜花开”，把当年的“桃千树”，不久前的“千帆过”和“万木春”，做了个可以说是万劫不复的总结；而“前度刘郎今又来”一语，真个豪迈桀骜，气度恢宏，生动体现了诗人高洁执著的风骨，证以白居易的“命压人头不奈何”，诚然无愧！

20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澳门回归一周年，堂堂中央电视台，再一次引用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这个年轻的、欣欣向荣的特区。错愕之余，想了许多，却又茫无头绪。或许，当年以这些颠三倒四的文字作为启蒙读物的学童，如今已长大成人，有些则开始充当“笔杆子”了。佳句能得流传，固为幸事，但这样流传，又实为不幸。刘郎有知，其复奈何？

目 录

从“茅奖”看批评家的身份	/1
我们怎样对话	
——以关于《大秦帝国》的争论为例	/9
谈基本判断	/16
拿什么来衡量批评家？	/23
现象学发凡	/30
谁向谁投降	/38
论“三大块”	/46
《南京！南京！》的日本感觉	/53
关于文学诺奖及其新得主的意识流	/58
伦理价值观的失范	/61
我的检查	/69
滑稽的“认可”	/79
想象力挑战智慧	/84
《金瓶梅》PK《红楼梦》	/91

把猫头鹰和夜莺分开 /98

不写什么:《色·戒》的底线在哪里? /104

玩一玩逻辑 /111

中国作家的生活方式 /117

“学术性”和“我认为” /123

谈谈历史感

——从陈红旗的《经典性的缺失和意义的祛蔽》谈起 /131

从一条被误读的悲哀的狗说开去 /141

“卖野人头”一解

——对一种批评的批评 /148

我想要的“新批评” /152

批评要从文本出发

——评翟业军《迟子建创作局限论》 /179

三十万亡灵魂归何处? /190

党性的光辉

——学习《昨夜西风凋碧树》笔记 /207

历史的细节和由细节拼接的历史

——读《定西孤儿院记事》 /214

从“茅奖”看批评家的身份

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界最具喜剧性的事件，恐怕要数王濛事件了。

如果你问：王濛是谁？答案是：她是一名短道速滑运动员，获得过四枚冬奥会金牌，其中在最近一届的温哥华冬奥会上，一人独得三枚金牌。

如果你问：王濛的身份是什么？答案就有点复杂了。准确地说，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短道速滑运动队的队员、队长。她这个“队长”身份，是跟着“队员”的身份走的，首先是队员，然后才是队长。不当队员了，就不能当队长了，不像别的“长”，比如“科长”，当了科长，就不当科员了。从本质——身份的本质——上说，她这个“长”不具有“干部”的身份，有点儿像部队里的班长。常说班长是“兵头将尾”，其实是错的。班长只是“兵头”，排长才是“将尾”。排长是军官，班长只是“士兵”里的那个“士”。我当兵那会儿，排长的军服上衣有四个兜，而班长和战士一样，只有两个

兜。就是现在，班长戴的军帽也和排长的不一样。

作为一名短道速滑运动员，王濛受到很多冰（上运动）迷的喜爱。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她所取得的成绩，是那四块奥运金牌，尤其是她在同一届冬奥会上连拿三块金牌。这是硬原因。不过，她能受到那么多的喜爱，也有软原因，比如她那张扬的个性，豪爽的性格，从拿下冠军后给教练的一跪，到公开指责国家队没有训练计划，扬言要回省队训练的放肆。在一部分冰迷那里，她受到喜爱的原因甚至还包括从爱喝酒到爱打架等一类“缺点”。她因此被称为“濛爷”。

最后还是这些缺点给她惹了祸。在接连发生了昆明打架事件和青岛内讧事件之后，她被撤了队长，开了队员，并被无期限地禁止参加国内外比赛。和我们很多报道一样，关于这些事的报道，需要“解读”之处甚多，而各种媒体上也确有甚多的“解读”。我只贡献一个此前尚未有过的解读，即那个禁赛的“无期限”。我当年被送去劳动教养，也是这种无期限劳教。“政府”对此的解读是：你明天改造好了，明天就解教；你一辈子改造不好，一辈子不解教。当然，改没改造好，要“组织上”说了算。所以我们的解读是：劳改有期，劳教无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看来这传统依然发扬光大着。

王濛的麻烦，完全是她的身份造成的。道理极明显，如果她是个职业运动员，比如像网球选手李娜那样，就不会被一个“正科”“副处”之类的人管着。施管的一方称“管理”，其实和神州大地上的很多管理一样，多半是只管不理的。李娜也有一个团队在替她管事儿，但只管事不管人。处理各种事务，港化了的媒体喜欢称之为“打理”；无论叫处理还是叫打理，一般不叫“管理”。但实际上那才应该叫管理，因为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所以，当李娜在北京奥运会对观众大喊“Shut up”之后，也有人表示不满，而对这种不满，有人“理”，却没人“管”。所

以李娜不会被开除，也不会被禁赛。

王濛的身份，也给广大冰迷带来了麻烦。冰迷们没有打架没有内讧啥错误没犯，却被剥夺了观赏王濛在冰场上一展英姿风采的权利。这就是“管”——或者说权力——的厉害。

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王濛当不了职业运动员，原因之一是她没那么多钱去雇用一个替她打理诸事的团队。至于她为什么没那么多钱，则是又一个问题。

我们的文学批评家的身份有好多种，唯独缺少一种。至少，在我知道的有一定影响的批评家中，没有一位是职业批评家。不同身份的批评家，往往（不是全部，但起码是大部）会写出不同的批评文章。比如：供职于大学的，叫“学院派批评”；供职于研究机构的，叫“学者型批评”；供职于作家协会的，叫“专业批评”。偶尔也有身份不明的，姑称之为“野路子批评”，“酷评”或可算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因为没有职业批评家，所以也就不会有“职业批评”。像我这种写小说的，原来当的就是专业作家，直到退休以后，才敢仗着胆子说自己把自己转为职业作家了，而且还得特别说明，我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已经有30年工龄了，现在拿的退休金，凭那段工龄就够了。即使如此，我在写批评文章时，仍不敢说那是职业批评，只敢说那是业余批评。

什么才是“职业批评”？以我的理解，就是当一部文学作品出版之后，出版者、作者都会以忐忑不安的敬畏心情去等待的那种批评，直到这些批评陆续刊出，总体上对这部作品基本认可，他们才会松了一口气。

我们有一种带有职业色彩的批评，直接印在了最新出版物的腰封上。这是一种职业化了的商业批评——虽然我不好意思将这种批评的署名者，统统称为“商业批评家”。

我们的批评家还有一种身份，这是一种临时性的、但却极具中国特色的身份——评委。原来的身份可能各不相同，有学院派

的，有学者型的，有专业的，为了一个共同的评奖、评排行榜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身份也就做了一个统一的转换，都成了评委。评委这个身份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你原来不管是什么身份的批评家，至少有一项权利，即对你没读过的作品保持沉默。千万不要小瞧了这项权利，因为当有人要你对某部作品发表意见时，你还可以说：对不起，我没读过。甚至在人家请求你百忙当中无论如何翻一翻时，你仍可以说：实在对不起，最近确实没有时间。然而一旦取得了评委身份，这个权利就被剥夺了。对于你即使一个字都没看过、也压根儿不想去看哪怕一个字的作品，你可以不发表意见，但必须表明态度。即便你不投票，或是投弃权票，都和投反对票没有丝毫不同。而在大多数实际操作中，往往是赞成的画个勾，空着的天然就是反对了。这就逼得最近有个大奖的评委不得不公开表示：正因为没读过，所以没给该作品投赞成票。该评委确实是个刚上路的评委新手，完全没有意识到因此会被人家追问：既然没读过，你凭什么就把人家给刷了？

这个大奖就是茅盾奖，那部未被读过的书就是《你在高原》。450 万字的此书最终高居榜首，引起了普遍质疑：62 位评委中，究竟有几位认真读过它？质疑者中，程永新成了“出头的椽子”，因为他说“全中国看过这部 400 多万字书的只一个人：责编”。我与程先生只在 30 多年前见过一面，但这个人我“认识”，所以他这次的表现确实让我颇觉意外——他把话说得这么不留余地，却又更加不留余地地独独赦免了责编。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当铁凝主席的《笨花》出版不久并好评如潮时，我曾有过一个想法：这部书有多少人精读了细读了我说不好，能肯定的是，唯独没有被责编有效地阅读过，否则，书中的男主人公向文成，就不会在民国八年被接到汉口时是个 14 岁的少年，到公元 1919 年便成长、成熟到想挑头带领村人和佟家清算被其霸占的四十亩官地，那担待起码得 20 岁往上了，可是书中又写

明他是光绪二十八年即 1902 年出生的，因此很容易算出，这一年——非常不幸，民国八年和公元 1919 年是同一年——他既不是 14 岁，也不是 20 多岁，而是 17 岁。当时只是“想法”，现在才说出来，是因为我认为《笨花》是一部可以流传的书，但不应带着此类瑕疵流传，捎带着也是想向程永新证明一下，你以为责编就一定好好读过？未必。

当然，我说的是“有效地阅读”。我能为大家贡献出这样一个新概念，端赖这次茅奖引发的阅读质疑。评委麦家表示：《你在高原》进入前 20 之前，他读过 6 册，然后，他“咬着牙用一天半的时间把它读完了”。一天半读完大约 200 万字，这也是一种读法。评委盛子潮说：“评奖期间我也看了其中的三部。”这又是一种读法。较正式的说法是“至少有十几位评委通读过”。这是另一种读法。但什么叫“通读”？是只看过头和尾，还是从头看到尾？是跳跳蹦蹦地从头看到尾，还是一字不落地看下来？就有评委雷达表示：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地读，凭着丰富的阅读经验，是可以对它的价值做出考量的。我还是佩服雷达。这是个实话，也是内行话。关键是你最后能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考量。你孤灯长夜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抠半天抠半天啥都没抠明白，那叫无效阅读。那么，众多评委中有人抠明白了吗？这点上我佩服周大新。他认为，普通读者如果没那么多时间，可以抽读其中几册，“即使只读几册，张伟的文字功夫和写作艺术你也能深刻地体会到”。毕竟是写小说的，懂眼。而且用的也是小说语言。如果翻译成批评语言，大意应该是：这部书的价值，就在于展示了作者的“文字功夫和写作艺术”，你只读其中的几册，比如说三册，就全明白了。那么另外的七册呢？如果也读，“体会”到的仍然是“文字功夫和写作艺术”，而这又是你不必再读也已经“体会”过了的。会不会另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恰好就放在了你没读过的那七册里，被你错过了？这

种事，你爱信你信，反正我不信。

不是评委的何建明，就显得不如评委们精明。这种傻实在，或许跟他写惯了报告文学有关。作为出版者，他严肃认真不走过场地告诉大家：“《你在高原》出版一年多来，已经在市场上销售2万余套。”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能想到，这种书，如果卖了2000套，那是被人买去看的；如果卖到了2万余套，那多半是被人买去当摆设的。

大评委有大评委的难处，小评委也有小评委的尴尬。某省要评本省的散文年度排行榜，就把省里散文写得好的都请去当评委了。当了评委，自己的作品照例不能参评，你说他们这排行榜还能评什么？

话说回来，批评家们只在拥有评委的身份时，尚能让出版者、作者觉得有所企盼，虽然还谈不上敬畏，且一旦任务完成，倒是挨骂的居多。除此而外，因为没有职业批评家的职业批评，其他身份的批评家就很难再从出版者、作者那里得到一点点敬、半点点畏。畏，或许并非必要；敬，则是不可或缺。因了这两条，批评界就不能不疲软，批评家就不能不委顿。

这是不是跟骨头有关？有一点关系，但关系不大。我这话，是汲取程永新的教训，给自己留点余地，更何况也真有某类软骨、无骨批评家。不过，此类批评家绝非中国特色，古今中外概莫能免，所以我真正想说的，直说就是与骨头无关，只与身份有关。君不见一些出道时颇有锋芒的批评家，随着身份的改变，自然而然就一天天疲软、委顿下去了。

例外总是有的。在疲软的批评界，不委顿的批评家还有几个。我不是业内人士，也无意列一份只能让自己显得像个大尾巴鹰的名单，只随手举几个名字，比如李建军、邵燕君、李美皆、何英。然后，你就很容易看出来，他们之所以不委顿或至少不太委顿，除了学养与见识（其实他们在这方面并不占多少优势），

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不太在意自己的身份，当然，若要公允，从另一面说，也因为他们的身份比较地可以不太在意。如果再细看看，就会看出在我随意写下的四个人名里，竟有三位是女性。性别也是一种身份。本来，我们的批评界还没有沦落到如创作界那样的阴盛阳衰，男批评家远多于女批评家，可是为什么一涉及委顿与否，就出现了相反的比例？身份。女性的挣钱养家的压力和责任低于男性，所以她们可以比较地不在乎。当然也有在乎的。

可能是不甘于批评界的疲软吧，《文学报》弄了个“新批评”。我对这一弄到现在还非常支持，但并不觉得他们弄得很好。开头还行。这个“还行”，不为别的，只为刊出了两篇分别由李建军和邵燕君执笔的文章。无论你提的方针多么正确，想的办法多么高明，最后还得靠文章说话。有了好文章，一句顶一万句；没有好文章，十万句也是瞎掰。找什么样的人才能写这样的文章？身份。找那些不太在意身份和身份可以不太在意的批评家。主其事者恰恰又在这上头出了个失误。多半是为了造声势吧，竟跑到北京去开了个“座谈会”，还把发言摘要登在了“新批评”上。失误在哪里？身份。请的都是些身份必须很在意的人，又是在必须格外在意身份的地方开会，能怎么“座”？能“谈”什么？读发言摘要，会议也请了李建军和邵燕君，可是就连这两位发言也挺没劲的。而在整个发言摘要中，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有好几位都说到了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个人情社会。要谈的是“新批评”，所谈的却是“人情社会”，将两者做个逻辑对接，就成了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你还弄什么“新批评”？

其实这事儿跟人情没有丝毫关系，只跟身份有关。别处虽然不一定是人情社会，但那个社会肯定也讲人情。你看别处拍的电影电视，里面也有“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一类

的对话。那他们又是怎样解决批评家的人情问题呢？让批评家们一个个都成为不讲人情的家伙？那同样是找挨骂。办法只有一个，而且极简单，那就是你既然想当一个批评家，就不要和出版者、作者交往，不欠他们的人情。我们有特别国情，做不到不欠人情，连少欠人情也做不到吗？对了，做不到。为什么？身份。只要你在这一元化的结构里拥有一个身份，你的身份就已经化在了那只有一个的“元”里。你既然要在这个“元”里与他人交往，就必定要和也在其中的出版者、作者交往，你也不必特意欠人情，那人情早就已经欠下了。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也有幸当上茅奖评委，即便我根本不认识关仁山，我能不给《麦河》打钩吗？

若要彻底灭了“新批评”的念想，与其提“人情社会”，还不如直接提“金钱社会”。在人情社会里，总还有人情不到的角落。我不给范小青打钩，就不给关仁山打钩顾虑小得多。但是在金钱社会里，到处都有金钱在滚动。你说你不向钱看？你不看它，它直接砸你脚面！注意！砸脚面跟进腰包还不太一样。因为——

和王濛一样，她当不成职业运动员，是因为没钱雇用一個替她打理诸事的团队，而我们当不成职业批评家，也是因为没钱使批评成为自己的职业。不要说过上相对体面的日子，就是养家糊口，就是仅仅让自己混个肚儿圆，就是……职业批评家有标准，也有成本；职业批评家必须保持很高的阅读量，读的书还必须自己花钱买，而单靠写批评文章所得的稿费，连买书的钱都不够。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们怎样对话

——以关于《大秦帝国》的争论为例

我注意到《文学报》上关于《大秦帝国》的争论，始于李星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争鸣》。不过，最初引起我注意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它的长度。文章登了两个版，而文后还附有编者说明：“原文一万两千余字，版面所限，略有删节。”李星是我的老相识，我一向佩服他的忠厚和严谨。看来他最近一定是特别地很忙，以至没有时间把文章写得短一些。然后我注意了一下文章的内容。坦白说，有几处不怎么懂。不过，就文中所涉及的那点事来说，我确实认为用不着说那么多话。再然后我注意到，他几次三番表示自己只是个搞文学评论的，不断地对自己的知识、视野等等的“局限”感到心里不踏实，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参与讨论那些历史、文明史、文化史方面的问题。于是我猜，这个老实人真是太老实了，以至被别人用一些大而无当的东西给绕住了。《大秦帝国》不就是一部小说吗？既然是搞文学评论的，你直说它究竟是不是一部好小说，不就完了？